

C H I N A

中国 报告文学 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报告文学精选

1997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97 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/中国作协创研部编. —武汉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1998
ISBN 7-5354-1700-0

I. 19… II. 中… III. 报告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 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0456 号

策划编辑:周百义
刘学明
责任编辑:周百义

封面设计:贺 凯
责任校对:朱久山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) 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
(电话:85837121)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版 次:1998 年 12 月第 1 版
字 数:327 千字

印刷者: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(电话:87543220)
插 页:2 印张:15.25
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1—3 000 册

ISBN 7—5354—1700—0/I·1353

定价:19.00 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编 选 说 明

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。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现在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决定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（分上、下两卷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四种。适当的时候再增加诗歌选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雷达同志总负责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

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

散文卷由吴秉杰同志负责

诗歌卷由张同吾、祁人同志负责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1996年9月

目 录

中国院士诞生记·····	邓琮琮 张建伟(1)
美丽与悲怆	
——浦熙修与她的年代·····	胡 平(127)
西上天山的女人 ·····	丰 收(181)
最后的疆界 ·····	徐 刚(252)
中国保姆的婚恋梦 ·····	郭传火(355)
附录一:1997 年报告文学的微薄收获 ·····	李炳银(471)
附录二:1997 年中国报告文学参考目录 ·····	(480)

中国院士诞生记

邓琮琮 张建伟

序章 从翰林到院士

那是 50 年代初期的一天，中南海。毛泽东召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高级知识分子议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郑重地召集高级知识分子商议事情，几乎都预示着有重大国事。解放初期的国旗问题，国徽问题，国歌问题，莫不如此。而这一次，商议的是一个词——院士。

走进中南海的郭沫若等科学家，有许多都是原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院士。新中国已经成立了，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科学院是否也要有一个院士制，是否在这座科学金字塔的塔尖上也点缀上一颗“院士”的明珠，以负起领导整个中国的科学学术之责，对此，毛泽东拿不定主意。

科学界议论纷纷，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们，有相当多的科学家希望恢复院士制。没有资料表明，在毛泽东召集的这次特殊会议上，有什么纷争的场面。但郭沫若先生一定慎重地考虑过这个问题。

在中南海,在毛泽东的身边,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“院士”这个词不能用,起码暂时不能用。那么,想个新词吧,要和“院士”一词具有同等的量级。起了好多个名称,毛泽东听了,连连摇头。最后他把目光转向郭沫若。

“沫若兄,”他过去这样称呼郭老,现在还是一样,“你有什么见解?”

“要我看,”郭沫若犹豫了一下,还是说了出来,“是否可以叫‘翰林’?”

毛泽东的眼中流露出惊讶,但突然间,爆发出一阵大笑。

所有的人都笑了。郭沫若自己也笑了。

可能,郭沫若的笑声中有些自嘲。作为一个从上个世纪走过来的科学家,他太知道翰林是什么了。

唐代以后,翰林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,而明清两代以后,要当上翰林,必须从进士中选拔。进士,已经是中国古代的高级知识分子,是通过先秀才,后举人,再进士,层层严格甚至严酷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。从唐代以来,一千多年的历史中,整个中国也不过产生了10万名左右的进士,他们当然是高级知识分子。而翰林,又是从进士中选拔的,甚至是皇帝、皇太后钦点的,所谓“点翰林”,民间戏曲里唱了一千年,说明翰林的知识地位的崇高和百姓的仰望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西方科学体制诞生出来的院士,确与中国的翰林有相通之处,都是最高层次的高级知识分子,都在知识金字塔的塔尖上,甚至,西方许多国家的院士,也需要皇帝、首相以尊崇的形式来授予。当然,在学术上,无论翰林还是院士,都是“领导层”。但,相通之处也就这些,其他,都是不同,甚至是本质的不同。

或许,郭沫若知道那些不同,所以当毛泽东大笑后,他也自嘲地笑了。而毛泽东,从学历上看,没有进入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。他

是师范毕业生，最高文凭算个中专吧。但他的学识，尤其是文史哲方面的修养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比不上。所以，中国历史上的翰林是怎么回事，他洞若观火。

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，终其一生，托身明主、展才济世，是他们的最高理想。这个理想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能够实现。他们必须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。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史，比比皆是怀才不遇和怀才误身者，而“不遇”和“误身”，大抵因为没能考中。

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举国的士子都仰望着科举制度顶上那颗耀眼的明珠，在黄土道上一路奔波，在形同监狱的考场格子间里憋写八股文，最好的结果就是进入翰林院，然后便可以“腾骧政路”，走进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尊宠的“士子升官图”中。否则，就是“怀才不遇”。

在那个时代，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有科举这一条通道。这是毛泽东最痛恨的事情。而且，考中了又怎么样呢？先秀才，后举人，再进士，钦点翰林，甚至，最后成了状元，成了所谓“当朝最有学问的人”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
毛泽东在史书中见过状元登科的场面。当一个人被宣布他考了第一时，紫禁城中那轻易不敲的钟鼓一下子就响彻云霄了。于是，披红装，挂红花，乘金辇，城官持缰，鸣锣开道——状元郎出来了。这一时刻，是举国的庆典，公卿以下，无不观看，就是朝廷里最大的官，也把宠爱的眼光递过去，琢磨着是不是把自己待价而沽的小女儿嫁给他。只要成了状元，就可能当大官，可能入阁拜相。中了状元，又当宰相，人世间的得意之事没有超过它的了。这就是那个科举荣身的制高点。

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，他读史书，却从来没有被所谓翰林、状元、宰相的学问、权势外表所迷惑。他有太多的开国经历，深深地知道，学问文章和打天下、治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毛泽东尤

其精通明清两代史，他在史书中发现，宋明以来，进入翰林院，甚至先当状元、后为宰相的人不少，但几乎没有一个是救国匡世的伟大人才。倒是那些能在八股时文以外，勤研实用经世之学问，并躬身力行的人，终能在时代潮流中脱颖而出。宋代的岳飞，明代的戚继光，以及清朝他最佩服的曾国藩，无不如此。而那些中过状元又当宰相的文学俊彦，其所学所用，不过是粉饰太平、坐享富贵的工具。和平时期，他们大言“一支笔横扫千军”，“胸中自有雄兵百万”，而国家社会一旦遭逢激变，他们无不束手无策，一筹莫展。于是只好“平时袖手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”了。语虽刻薄，却是事实。而且，“袖手谈心性”者多之，“一死报君王”者少之：清朝时一个没有，南宋的状元郎文天祥似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。

毛泽东认为那个统治了中国数千年的科举——翰林制的灭亡是必然的。

翰林制的灭亡在清末，但至少经历了两次反动。1911年，清朝灭亡，翰林制才被彻底摧毁。

这样一种腐朽的知识体制，新中国怎么能恢复它呢。

当然，毛泽东知道，郭沫若先生提出以“翰林”代“院士”，有他特定的含义在，那就是，我们可以给“翰林”这个词赋予新的内容而推陈出新。但毛泽东觉得，它太旧了，已经是一具陈尸，没有任何一种起死回生的药能使它复活。于是，毛泽东说：“历代的翰林、状元都没有出色的。李白、杜甫不是进士，也不是翰林；韩愈、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；王实甫、关汉卿、罗贯中、蒲松龄、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。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，也都是不成功的。”

因此，算啦，“翰林”这个词，我们不用。

所有的科学家都为难了。翰林，不能用；院士，不想用；想出来的词，又要与院士有同样的量级。难乎哉！

但还是要想。而且,要想出能与院士有同等量级的词,先要知道院士是什么。

古希腊的传说。有一年,宙斯预言,雅典城将发生一场大灾难。举国皆慌。这时,出现了一位叫阿卡德莫斯的英雄,要把雅典从灾难中解救出来。灾难果然发生了。阿卡德莫斯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,使雅典免遭劫难。而他本人,却为了解救国家和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为了纪念这位智慧勇敢的英雄,希腊人把他葬在雅典城的西北郊,他的墓地四周,环绕着青青的橄榄林。他的名字便成为这处幽静园林的名称——阿卡德米。

公元前387年,柏拉图走进了这片园林。智慧勇敢的阿卡德米的事迹感动了这位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。他留在了那里,开始讲学,并因此形成了柏拉图学派。柏拉图死后,他的科学学派持续了下去,学派的学术活动,仍在阿卡德米园林中进行。就在这里,形成了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种精神:怀疑精神。因此,后人将阿卡德米园也叫作柏拉图学园。它顽强地生存了916年。

任何专制制度都不允许怀疑精神的存在。公元529年,灭亡了古希腊的罗马帝国,把这座学园中的科学家们赶了出去。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家学园被封了门。

经过漫漫的中世纪长夜,欧洲文艺复兴降临科苑。新柏拉图主义在意大利复活,科学家们忽然想起了阿卡德米园。学术团体纷纷成立,许多都自称“阿卡德米”,它几乎成为科学学术团体的共名。学术团体的纷起,预示着科学研究机构的诞生,而研究机构,又是科学院的助产婆。

在“阿卡德米”的推动下,科学院诞生了。

16世纪后期,新生的资产阶级开始青睐科学的力量。他们发现,科学能给他们带来滚滚的财富。因此,商人们解开钱袋,资助科学学会,发展科学组织,终于创办了科学院。

有个叫格雷山姆的亿万富翁，去世时立下遗嘱，建立一所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以科学活动为主的科学院——格雷山姆学院。该学院便成为英国科学家自由聚会的中心。

1662 年，正是在格雷山姆等学院的基础上，在国王查理二世的特许下，英国皇家学会（国家科学院）诞生了。近代科学有了自己的国家最高学术机构，近代科学家有了自己正式的家园。

四年后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批准成立了法国皇家科学院。国王亲自招聘著名科学家到科学院里来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。然而，国王亲自招聘来的科学家当与一般的科学家不同，应该给他们命名一个什么称号呢？阿卡德米——人们又想起了古希腊的这位智慧精神的代表。

今天，当我们在世界院士史上检索“院士”这个词的来源时，发现它竟穿越了数千年的时空。这个词的西文拼法是：Member Of Academy，直译为中文：阿卡德米的成员。

阿卡德米——院士。1666 年，法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批国家科学院的院士。

此后，英国皇家学会，普鲁士皇家科学院，彼得堡皇家科学院，纷纷使用“院士”这一称谓，来命名自己国家最杰出的科学家。这是学术界给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。

院士和院士制度就这样诞生了。此后历经数百年，各国科学院的规模和职能各有不同的变化，然而，科学院由院士组成，这一特质从来没有变化。

只有在中国，院士和院士制的最终形成，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。

17 世纪的最后三个 10 年——法国院士制刚刚诞生的时代，清朝的康熙皇帝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两大贡献：改造观象台，绘制《皇舆全览图》。这两件科学大事都是由西方科学家主持完成

的。观象台改造工程的统帅，是比利时人南怀仁；而《皇舆全览图》的绘制者，就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。这是西方院士和中国的第一次亲缘。

康熙从小好学，南怀仁为他改造了观象台后，引发了他对西学的兴趣，他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南怀仁。

世界真小。康熙皇帝好学西学的名声竟传到了欧洲。法国皇帝路易十四闻讯十分高兴，一个神秘国家的皇帝居然雅好西学，这勾起了他的好奇心，乃派五位精通天文的教士，万里迢迢，前往中国。

五位法国教士抵达北京时，是在1688年2月，南怀仁刚刚去世。当时正值中国的强盛时期，不怕外来文化的所谓“同化”。康熙皇帝同意其中的三位教士在中国传教，而留另两位在京供职。这两位法国教士一个叫张诚，一个叫白晋，二人来头不小，都是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！此时，距路易皇帝第一次钦封院士（1666年），仅仅过去了22年。从此，两位法国院士，成了康熙皇帝的私人教师。张诚专门为康熙皇帝撰写教材，而白晋就为康熙讲课。

康熙皇帝乃强国之君，不仅博学，而且能征惯战。即位12年，平三藩、收台湾，完成了统一大业。1689年，与俄国签订《中俄尼布楚条约》，划定了北方边界。踌躇满志之余，他萌生了一个念头：要看看自己国土究竟有多大，状况又如何？他要白晋院士来主持这一庞大的工程。

一年前，他在与俄国人谈判时，选的是张诚院士为随身翻译。结果张诚的地理学知识帮中国收回了两千余里失地。此事，康熙印象深刻。既有如此人才，他打定主意，搞一次前无古人的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工程。众所周知，即使在今天，要搞这样的工程，也是一件了不得的科学项目。

1693年，白晋奉康熙之命返法，觐见路易十四，并广招人才。

越四年,率同行巴多明等 10 人返华。1708 年,康熙皇帝决心把绘制皇舆全览图的计划付诸实施。6 月 4 日,白晋院士等人登上了中国长城。这里,将是他们测绘的起点。到翌年的 10 月 12 日,经过一年四个月的时间,他们才返回北京,完成了中国的长城地理图。

如此艰难的工程,如此耗费时日,全国地图,何日能绘完?康熙皇帝着急了。谕令:加派人丁,组成测绘队,每队都由法国院士或科学家率领,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测绘工作。就这样,到测绘工作全部完成,已经是 1717 年 1 月 1 日。整整进行了九年!最后,白晋院士绘成全国地图、分省地图各一张,于 1718 年进呈康熙。中国的皇帝(也是所有的中国人)第一次能在有实测依据的地图上,把自己的万里江山一览无余,其心境如何,可想而知。康熙大喜,当即挥毫,奋笔直书,命名地图为《皇舆全览图》。

即使在欧洲,这桩工作也令人瞩目。其时,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工作尚未开始。科学家们证明地球是椭圆柱体,也还是一个刚刚提出的假说。因此,这份四十万分之一的地图,实在也是世界地图史上的大事。但皇帝的意志多变。1720 年前后,康熙皇帝与罗马教皇发生了“礼仪之争”,实际上是罗马教皇与康熙皇帝的权力在中国谁比谁大的问题。虽有白晋院士从中斡旋,企图求一折衷之法,终于失败。1720 年,康熙皇帝谕令,境内传教事业,“禁止可也,免得多事”。一纸诏书,把罗马教皇的权力之梦赶回了大洋彼岸。

但当时的西方科学家,包括院士,大多都是天主教的教士。赶走了教士,等于赶走了西方科学家。西方院士和院士制在中国如昙花一现,消失了。此后直到 1840 年,120 年间,再无西方院士来华。

1840 年后的西方向中国的传教,是炮舰打进来的。中国再次接触西方科学,其滋味已经大大不同。

1879 年(光绪四年)6 月,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在巴黎会见了法国科学院院长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中国人

第二次与西方院士的照面。此时的西方科学，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。法国科学院也不再属于“皇家”，但院士制和院士称号一仍其旧。郭嵩焘不知道什么是院士。但他看到了，院士在法国科学界的地位至高无上，每届只有145位，去世一位才能增补一位。而他更为惊讶的是，在以往院士的名单中，竟有拿破仑的名字。

拿破仑——一位伟大的皇帝，居然也是院士，郭嵩焘想，可能就因为他是皇帝，才把院士的头衔献给了他吧。但，皇帝可以有假的，院士不能有假的。拿破仑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家。拿破仑的一生，多是马上生涯，但更喜欢与科学为伍。在他的身边——即使在行军作战时——总是簇拥着各种学科的科学家。他经常出“难题”，向科学家们“将军”。他的院士资格不是“荣誉的”，而是竞争当选的。1797年12月，他与11位科学家候选人公开竞争，以数学上的博深造诣，最后当选为数学部院士。他对这一称号比对“总司令”的头衔还要得意。此后他在所有命令和文告上签名都要写上：“科学家院士、东征方面军总司令”。

一个科学家皇帝，当然懂得科学和科学家的价值。他鼓励发明，推广技术，宏扬科学，重奖科学创造。罐头的发明者——一位工程师，获得了拿破仑亲自授予的1.2万法郎的奖金。他是科学家们的挚友。两军交战时，他总是预先把科学家们送到安全地带。1814年，反法联军兵临城下，法国兵源不足，有人提议调理工学校学生参战。拿破仑说：“我不愿为取金蛋杀掉我的老母鸡。”这句名言，至今刻在该校梯形大教室的天花板上。他说，“科学打开了这么多秘密之门，消除了这么多偏见，为了使科学给我们建立更大的功勋，让我们鼓励科学、热爱科学吧。”

可以肯定，这样一位皇帝院士，会给中国的大使郭嵩焘留下深刻印象。他考察了法国科学院并知道了法国院士的一些事情后，称那位科学院的院长为“翰林总裁”，称科学院的院士们为“翰林”。他

想,外国有的,中国也肯定有,外国有院士,中国有翰林,那是一样的。

懂得的与不懂得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。

那么,中国何时诞生了院士呢?

中国最早的院士诞生于 1948 年。比西方院士的诞生,迟了 282 年。这不仅是一个院士词组的迟到,它是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在中国的迟到。

院士与翰林最本质的区别是:翰林为知识分子升官而产生,院士为科学发展而助动;翰林是中国科举制的归宿,院士是现代科学体制的硕果;翰林是在封建制度下滞后于科学的传统教育中孵化出来的,院士必须由永远站立在世界潮头的现代教育科学所孕育。

有一个现象:在世界各国,几乎都是先有院士而后有科学院,科学院必须以院士为学术领导和其基本的成员。而在中国,1928 年便成立了中央研究院,但其中却只有研究机构,实行院士制是在整整 20 年后的 1948 年。这种科学院与院士的倒置不是偶然的。没有现代化的教育,培养不出现代化的学子;没有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学子,从事不了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;没有现代科学研究,便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团体的基础;没有现代科学团体的存在,就产生不了科学家;没有大量存在的科学家,从何产生科学家中的精英——科学院士?而这条路——这条能够产生出中国院士的道路,中国人走了好长好长。

1862 年,大清朝创办同文馆,五年后设天文算学课,由西方传教士授课。又过五年,方才有了一份“八年课程表”。

1866 年,马尾造船厂附设一个西式工业技术学校——福建船政学堂,为中国第一个官办的现代意义的学堂。此后,民间“新学堂”在中国兴起。

1880 年,开天津水师学堂,为中国第一所军事学校。

1882年,同文馆校长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访西方,收集西方教育资料,于1883年出版了现代教育专著《西学考略》。

1887年,算学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。

1886年,撤销“四书五经”课程。

1898年,光绪皇帝下令“废科举”,当年失败,科举制恢复。

1901年,慈禧下诏变法,开经济特科,为八股取士之补充。8月废八股取士。同年9月,诏令各省设立学堂,为大兴现代教育之始。同年,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。同年,张百熙拟定《钦定学堂章程》,为中国公布的第一个法定的、完备的学校章程,从蒙学(幼儿教育)、小学、中学、高等学堂、大学预科、大学堂直至大学院(相当研究生院),都有了法定的规定,史称“壬寅学制”。

1905年,彻底废除科举制。

这张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生产清单说明了什么呢?它说明,中国的学生,今后再上学,已经有了学习“新学”的体制,而废除科举,又堵死了文行旧轨——从知识阶层(士子)向政治领域(官僚)进军的唯一途径。只有在这样的“新学体制”下,才会逐渐产生新的学人和新型的现代科学家。但要产生出院士,这样的教育还差得很远。首先,虽然有大学的制度,可现代大学的师资在哪里?而没有现代大学教育,又怎能教育出现代科学家?名师才能出高徒。中国先得有自己的名师。

中国第一代留学热,就在这时候汹涌起来。首先是东洋留学潮。1900年,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100人左右,到1906年,达到了1500名。

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起了最大推动力的是潮涌西洋的“庚款留学”。1900年,八国联军打入中国,与清政府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,其战争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。规定分39年还清,本息合计,达9亿8千万两!